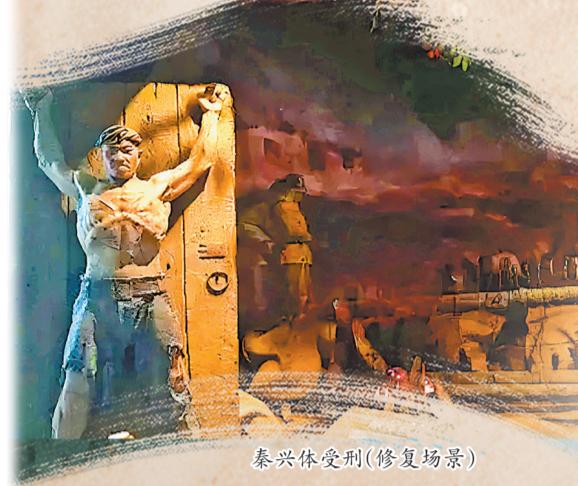


“我就是共产党，冲我来”

——追忆抗日烈士秦兴体



秦兴体受刑(修复场景)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当侵略者的铁蹄踏碎山河，是一个个单薄的身躯筑起不倒的屏障，直至生命最后一刻。这些身影，永在民族的星河中熠熠生辉。

7月21日，曹县韩集镇刘岗村绿荫如盖，东侧的全民健身广场上，孩童的欢笑与蝉鸣交织。广



村民瞻仰秦兴体烈士纪念碑

场一角，一座青灰色石碑静立，碑文记载着1943年深秋的悲壮往事——日军在此制造“水牢惨案”，八路军战士秦兴体为护村民被敌人开膛破肚壮烈牺牲，至死未吐露半字机密。

82年光阴流转，这段浸透鲜血的记忆，早已融入鲁西南大地的血脉，化作一座精神灯塔。

秦兴体，1905年出生于河南省修武县，1924年加入中国共青团，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爆发后，返乡组建修武抗日游击队，后被编为八路军，从此一路随军抗日。

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分割封锁、铁壁合围，疯狂地施行“三光政策”。

抗战时期，曹县“红三村”是鲁西南抗日根据地核心区，大量军粮、枪支弹药等抗日物资深藏于村中，秦兴体任冀鲁豫第十军分区后勤股长。敌军曾多次重兵围剿，却因“红三村”军民齐心的铁壁防线屡屡溃败。

10月初，日军集结2万余人，在军团司令官多喜一的指挥下，兵分7路，向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疯狂扑来，准备进行奔袭合围的“大扫荡”。10月6日拂晓，1500余名敌军悄悄包围了“红三村”。秦兴体一边组织人员阻击敌人，一边掩护群众突围撤离。由于敌众我寡，他与千余名村民一同被围困于刘岗村。

敌军将百姓驱赶至水牢，深秋的冷水浸透单衣。秋水刺骨，机枪环伺，水牢化作人间地狱。但面对张牙舞爪的日寇，“红三村”村民处之泰然，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信念：誓死保护八路军，保护军用物资。

为逼问八路军和物资下落，日军当众枪杀3名村民。站在群众中间的秦兴体目睹此景，心如刀绞，几次欲冲出拼命，但都被村民制止。

下午，更加残酷的审讯开始了。敌人在坑边放了张刑床，不时地从水坑里拉出村民捆在

刑床上进行严刑拷打。但敌人的残酷暴行没有吓倒群众，不管怎么审讯，他们始终咬定“不知道”。

久审不下，多喜成一盛怒。这时，浑身颤抖的秦兴体猛然拨开护住他的村民，冲出水中挺身长啸：“我就是共产党，我就是八路军！”又指着水坑里的百姓，说：“与他们无关，把他们放了，要杀要剐，冲我来！”

闻言，日军如获至宝。多喜成一狞笑逼近：“物资在哪里？说出来，奖赏大大的有！”回应他的是沉默的怒视。

诱降不成，敌人对秦兴体实施了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皮鞭撕裂单衣，撕开皮肉，黑色硫酸液灼烧肌肤，冒出焦烟，血泡迸裂；浊水灌口，腹部高高鼓起后，又用木棍反复砸压，肚血水从口中喷溅而出……面对一道道酷刑，秦兴体凭借顽强的革命意志，硬是咬牙挺了过来。

酷刑期间，秦兴体满脸血水，满身溃肉，仍向群众嘶吼：“乡亲们，抬起头来，不要伤心难过，中国人民是有骨气的。抗战一定会取得胜利！咱们的大部队马上就要回来，他们会为死难的乡亲报仇。血债终要血来偿！我们要坚持到底，和日寇奸斗争到底……”

目睹英雄惨状，群众们忍无可忍，纷纷站出来，冲上去要和敌人拼命，敌人立即开枪打死十几名群众。

面对敌人，秦兴体始终坚贞不屈。惨无人道的日军，最后活活把秦兴体开膛破肚……

日军在“红三村”施尽暴行，秦兴体烈士和73名村民惨遭杀害。但最终一无所获，垂头丧气撤军。

铮铮铁骨铸忠魂。英雄秦兴体，守护的不仅是军用物资，更是鲁西南不屈的脊梁。



记录了秦兴体等烈士事迹的卧碑

2013年春天，刘岗村的村民刘效民等3位平均86岁的老人，联名给《菏泽日报》写了一封信，信文朴实质恳：“我们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希望给心中的英雄——秦兴体重新树碑立传，以发扬光大他的英雄事迹，否则我们觉得愧对英烈，愧对历史……这是我们人生暮年最后的牵挂，办好这件事，我们可以无憾瞑目了……”

为了筹立碑，3位老人拿着笸箩在村里募捐，最后募集到5万元，捐款的人都没有留下姓名。韩集镇政府为了帮助村民完成心愿，也做了大量工作。2015年9月2日，抗日烈士秦兴体纪念碑揭幕仪式在刘岗村举行，上千名村民参加，现场啜泣声不绝。

盛夏的风掠过，秦兴体纪念碑静默如凝固的时光，碑文晒得发烫。这些镌刻的文字并非符号，而是曾奔涌的热血、未尽的期盼。

文/图 记者 马源勤



趣谈鲁西南方言土语——『不通何物』

一个人在社会上生活，从出生起就要不断地学习，但人与人的情商、智商等认知方面是存在差异的，加之自身努力的原因等，这就导致一些人在学习、社会交往方面的低下，在与人交往中往往出丑，不被他人所接纳，造成笑话。这样的人也被鲁西南民间斥之为“不通何物”。

“不通何物”这个词语在菏泽民间流传广泛，这是对某人进行整体评价时用的一个词语。从字面上来理解，就是什么也不懂的意思。但如果用在日常的评价上，就是极为严重的人格评判了。如果说一个人“不通何物”，那就代表这个人没文化、没素质、没道德、没人品等等。那么，这个“不通何物”的典故是怎么来的呢？这就不得不提到被康熙皇帝称赞为“操守为天下第一”的张伯行。

张伯行是今河南省兰考县人，清代著名的理学家、文学家和教育家。他1685年中进士，1722年被钦点为会试总裁，担任顺天乡试的正考官。其在担任考官的时候，曾亲自出题来考试。封建社会比较注重孝道，所出题目也多是源自“四书五经”。于是，在一次考试时，张伯行就出了一个名为“事父母”的题目让考生作答。此题目出自《论语》：“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如果让现在的中学生来写这篇作文，应该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封建的科举制度考试要求必须是“八股文”，这种文章必须要按规定的格式来写，文章总体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所以叫“八股文”。如果不按照这种固定的格式来写，就不能入选。一位迂腐的考生为了在开头的时候“破题”，于是生搬硬套，用设问句开头，写下了“夫父母，何物也？”一句用于破题。卷子交到了张伯行这里，张伯行看后哭笑不得，他批阅了两句话：“父，阳物也；母，阴物也！阴阳配合，乃生此怪物也！”连父母都不知道是什么的人，到底他本身是个什么呢？这样的话都敢写，估计这个考生更不通晓“四书五经”的内容了。作为齐鲁之乡、礼仪之邦的山东，封建时代对孔孟之道尤为重视，特别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纲常之道，这个人连起码的认知都没有，所以“不通何物”也就成了贬低人的话。这个笑话迅速在当时的文人中传开了，估计也传到张伯行的家乡兰考，兰考与鲁西南相邻不远，故而“不通何物”也成为了菏泽一带的语言典故。

当然，“不通何物”这个词在其它地方也存在，也并不是菏泽地区的原创，但就方言土语来说，在菏泽的民间流传还是很广泛的。现在，通过这个典故，从另一个方面也就加深了对鲁西南方言土语背后的的文化认识。

张长国



冉家大院的家族记忆

冉家大院，位于菏泽城区广福街与道碑街的交叉口，即道碑首的西北向。当时这里是菏泽县委机关所在地，后来改建为县委家属院。

冉家大院(又称“冉家房子”)，主体为砖木结构，坐北向南，是一处典型的明清时期传统建筑院落。从远处望去，大院四面围墙，房厅错落，青砖灰瓦，严谨有序，仿佛在诉说着过往的辉煌。大院的正门、高台之上是一座高大的木制门楼，门楣之上刻制“载阳凝瑞”四字，笔力遒劲，彰显出家族的威严。

院内的布局，自南向北依次为前院、后院、花园组成。前院，有大门和东西厢房，房子主要用来迎客，房间宽敞明亮，门窗雕工精美，图案寓意吉祥。后院，前有过庭(又称二门)、东西厢房和正房，这里主要是居住区。过庭门洞三间，重梁起架，前后出厦。正房致，两旁还有观花楼。后面是花园，内有假山叠翠，花木错落，四季景色各异。

冉家大院建于1936年，原为日本维持会菏泽县伪县长冉籍五的旧宅。据资料记载，院落南北长100米，东西宽50米，占地面积5000平方米，建筑面积679.5平方米。由前后二进院及花园组成。主建筑是过厅，东西12.4米，南北7.5米，高6.5米。硬山式结构，重梁起架，明柱两根。此建筑是鲁西南地区的民居代表之作。

冉籍五(1878年—1944年)，今菏泽市鲁西南区程街街道办事处张什店(又称冉贤集)人。他出身一个普通农家，家中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三。其长兄为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旅长，冉籍五凭借哥哥

的权势，曾充任段祺瑞的侍从武官。1913年，冉籍五出任军阀孙传芳的漳州警备司令，后又任大炮团的团长。

在北伐战争前，冉籍五就回到菏泽老家张什店。由于冉籍五在部队时就贪污了大量军费而发了家，于是在菏泽城内购置了房地，建造了这处相当规模而又漂亮的宅院，人们都称“冉家大院”。1938年春，日军攻占菏泽，冉籍五投靠了日本侵略者，出任伪菏泽县第一任汉奸县长，充当了日军的鹰犬。

冉籍五在担任伪县长期间，为虎作伥，协助日军对菏泽人民进行了各种侵害活动。曾派人到农村和街道搜刮民财，欺压百姓，并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和搜捕，甚至不惜杀害抗日志士和爱国同胞。冉籍五的汉奸行为，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抗日力量，给菏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善恶终有报，1944年7月，冉籍五暴病死于家中。他的故事成为菏泽人民心目中的一道伤疤，也成为了历史的警示。

冉籍五的老家——张什店村，人们又称“冉贤集”。前几年，我专程去探访过，该村的古名叫荆园坡，为先贤冉仲弓(冉雍)的故里。现村中居民冉姓最多，在这里冉家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家族。在村东北隅还有处“先贤冉子仲弓祠”，俗称“冉家祠堂”。祠堂的大门人称“广连门”，沿街面南，高高地耸立在台阶之上，造型古朴典雅，宽敞雄伟，气势庄重。

广连门内有三块石碑，一块是“先贤冉子故



冉祠中的大殿

里”碑，一块是“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碑，一块是“维修捐资纪念碑”。向北是一条青砖小路，两侧几棵松柏，苍劲挺拔。迎面是大殿，墀高三尺，五层台阶。大殿是刚维修不久的，上顶彩釉，瓦吻吻脊。四角铁马风铃，铮铮悦耳。门前丹柱横梁，上有匾额，为立槽式蓝底金边，上书“薛公殿”三个大字。大殿东南还有棵高大的楷树，据说是800余年的历史，是从孔林移栽来的。

大殿内，正堂三尊神像，供有冉耕、冉雍、冉求的塑像。据《冉氏宗谱》记载，此祠堂始建于汉武帝建元年(公元前140年)，唐贞观年间重修，明清时期多次重修，以后形成规模。原祠堂内还有二门、东司、西司和启贤殿，“文革”中都被毁。冉氏系少昊之裔，周文王之后，曹叔振铎传至冉离，世居菏泽之阳，以牧业为生，后有长子耕、次子雍、三子求，兄弟三人品学兼优，皆被誉为孔门七十二贤，位居十哲之首。明清两代，冉家逐渐发展壮

大，成为名门望族。其后裔，在当地一直享有较高的声誉。清代中期，家族出了多位进士和举人。然而，到了近代，随着社会的动荡与变迁，冉氏家族也经历了风雨飘摇。抗日战争时期就出现了冉籍五，他背叛民族大义，投靠了日本侵略者，成为了臭名昭著的卖国贼。他的行为不仅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巨大伤害，也给冉家的名声蒙上了一层阴影。

再回看老城中的“冉家大院”和“冉家祠堂”，它既见证了无数个风雨沧桑，经历了一个荣辱交织的复杂过程，也成为菏泽这座城市历史文化的缩影。冉家的辉煌与文化传承，是家族的荣耀。而冉籍五的汉奸行为，则是对家族的警示。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无论家族多么高贵，都必须坚持民族大义和基本道德为底线，这才能在时代的洪流中立于不败之地。

文/图 邓文献

在菏泽粮校退休老人武健的家中，一张泛黄的旧照片静静躺在书桌中央。照片里的男子眼神如炬——那是他的父亲武斌文，南苑会战的百名幸存者之一。

“爷爷是军人，父亲幼年

就在军营里长大，既学了文化，也早早接触了进步思想。”武健轻抚照片边缘，回忆着父亲的往事。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武斌文投笔从戎加入国民党二十九军，成为赵登禹将军麾下的医务副官。

“南苑会战的惨烈，是父亲毕生难忘的记忆。在敌人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及疯狂围剿下，他们不足百人硬生生冲出包围圈。赵登禹将军突围时不幸殉国，父亲左臂肘关节被弹片击中，弹片嵌在臂骨里取不出来，成了终身残疾。”武健说，作为幸存者，武斌文带着伤痛转战，却因“亲共”倾向被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特务盯上，疗养期间屡遭骚扰恐吓。

1938年，武斌文返回

故里菏泽，竟成了命运的转折——在这里，他遇

见了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表哥何健之，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启了全新的战斗生涯。

“由于父亲受到过良好

的文化教育，见过世面，也粗通日语，于是便被党组织

和舅舅何健之派遣打入日伪‘新民会’。我们家

直到全国解放都一直在舅舅家，肩负使命，有

效地运作着党的革命工作联络站。”武健说。

潜伏生涯充满惊心动魄的日常。“贴传单要

趁深夜，舅妈和母亲打浆糊，表姐何建勤在门口

望风，父亲负责张贴。”武健告诉记者，最惊险的

一次，武斌文将敌我形势对比图直接贴到日军

军营外墙。但他刚撤离，就被日本人发现，凭着

‘新民会’指导员身份和流利日语才蒙混过关。

次日，“对比图”事件全城轰动，极大地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

为建立情报据点，武斌文发展了照相馆青

年李明轩。

至此，凡

是来照相的日寇驻军

人员，伪政府的人员及军、警、宪的照片，都会被

作为情报送到外线去。

同时，照相馆也方便了

我方人员拍照，制作“良民证”，为进出城提

供了便利。

在敌人阵营中，武斌文的工作不止于情报

搜集，他和先期打入日伪菏泽县警备大队的共

产党员付理轩及其他党员同志，不但先后多次

营救过我党被捕的多名同志，转送大量的情报

和药品，还从多方面、多角度地开展对日伪各

类人员的分化瓦解工作。

“父亲他们给可争取的人发‘同情证’，上面

印着关公像，暗喻‘人在曹营心在汉’。”武健

</div